

基于职业与收入双路径的代际流动性研究

黄思扬, 刘桂兰, 周柯彤, 刘丹, 张继前

湖南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2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3月19日

摘要

本文聚焦于中国代际流动的“职业-收入”双路径机制, 分析了在2023~2025年新一轮政策与数字经济浪潮中, 传统的父辈资本影响与新兴的数字技术赋能如何重塑社会流动格局。研究指出, 尽管“十二年免费教育”显著提升了教育公平性, 降低了学历通胀带来的劣势, 但升学后的“岗位上升”与“收入溢价”之间仍存在显著断裂, 形成了职业晋升难以兑现收入红利的“分治”格局。数字技术虽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重塑技能需求和创建新型就业形态, 为农村和弱势群体提供了跨越传统壁垒的渠道, 但也存在“数字鸿沟”与“表层流动”风险, 可能在特定阈值下加剧不平等。文章主张, 未来政策应从单一的“学历通胀”治理转向“岗位-报酬”联动治理, 打破城乡与职业壁垒, 并在数字化进程中警惕“数字代际转移”风险, 以实现真正的代际向上流动。

关键词

代际流动, 职业路径, 收入路径, 数字技术

Research o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Based on Dual Paths of Occupation and Income

Siyang Huang, Guilan Liu, Ketong Zhou, Dan Liu, Jiqian Zh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Banking,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January 29, 2026; accepted: February 9, 2026; published: March 19,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ccupation-income” dual-path mechanism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China, analyzing how traditional parental capital influence and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reshape the social mobility pattern amid the new wave of policies and digital economy

from 2023 to 2025.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although the “12-year free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ducational equity and reduced disadvantages brought by academic inflation, there is still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position advancement” and “income premium” after further education, forming a “divide and rule” pattern where career advancement fails to deliver income dividends. Although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s rural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with channels to overcome traditional barriers by reduc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reshaping skill demands, and creating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it also poses risks of “digital divide” and “superficial mobility”, which may exacerbate inequality beyond a certain threshold. The article advocates that future policies should shift from a singular focus on “academic inflation” governance to 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position-reward” linkage, breaking urban-rural and occupational barriers, and being vigilant about the risk of “digital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iz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genuine upwar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Career Path, Income Path, Digital Techn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023~2025年，中央层面连续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写进最新政策顶层文件，并首次把“职业-收入”双路径协同纳入制度设计，为代际流动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语境。2024年11月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于2025年6月1日起实施，该法在立法目的中明确规定，旨在“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提高全民族素质”，并构建“公益普惠”的公共服务体系，以保障各类困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这标志着国家以最高法律形式，将保障起点公平、通过教育干预促进社会流动上升为明确的法定职责。2024年度上海等地已将“发展型社会救助”列入地方试点，通过“艺术护照”等非物质帮扶项目，为低收入家庭3~12岁儿童建立持续8年的文化教育干预，直接瞄准代际流动的起点环节。当前，我国教育政策的基点是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在此背景下，部分地区已先行先试，探索实施了覆盖高中阶段的十二年免费教育，为政策讨论提供了地方实践经验。研究表明，此类通过公共财政移除家庭教育经济门槛的政策，能有效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例如，珠海的政策实施后，高中阶段入学率显著提升，切实帮助了众多低收入家庭子女继续学业，这从机制上为提升代际流动性、缩小教育不平等提供了有力的地方实践证据。但升学之后能否获得优质岗位、岗位晋升能否兑现收入溢价，政策链条在此出现断裂。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衔接阶段，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技能致富”与“财产致富”并重，要求“到2025年初步建成覆盖县域的职业教育中心+产权流转市场双平台”，意味着政策不再单兵推进“岗位上升”或“收入上升”，而是尝试让职业晋升与收入跃升在县域层面形成闭环，但未明确制度负责检验“闭环”是否真正闭合。这也暴露出深层制度缺陷，教育部门的KPI止于“升学率”和“职业等级提升”；人社部门的“技能提升行动”不追踪受训者后续收入变动；发改、财税部门酝酿中的房地产税、遗产税再分配方案，又仅关注“收入基尼系数”单一指标，不追问高收入者的财富积累是否绕过职业通道。职业政策不问收入效果，收入政策不管职业路径，这种“分治”格局与学术文献中“职业-收入”两条平行主线相互强化，导致政策效果评估极易高估单向红利。本文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把“职业-收入”异步问题拉回代际流动研究的中心，检验二者在新政策组合下的真实互动，为打通“职业-收入”闭环提供证据。

1.2. 研究目的

本文以“职业-收入”双路径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中国代际流动的内在机制与时代演变。首先，基于代际职业流动相关研究，刻画父辈资本对子代职业地位的影响机制，识别数字技术赋能下职业路径的传导逻辑与边际效应变化；其次，利用代际收入流动相关研究，分析父代资本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与文化资本传递的微观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对收入路径的重塑作用；最终，为构建“教育-岗位-报酬”全链条联动的解释模型，打通政策“分治”格局、实现职业晋升与收入跃升的有效衔接提供理论依据。

2. 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2.1. 代际职业流动中的父辈资本影响

代际职业流动是衡量社会开放性与机会平等的重要指标，它反映了子代职业地位相对于父辈的变化程度。在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宏观背景下，探讨父辈资本如何影响子代的职业命运，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也对理解当前社会结构、制定促进公平的政策具有现实意义。现有研究普遍指出，父辈所拥有的各类资本——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等——构成了子代职业发展的起点，这些资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作用于劳动力市场，深刻影响着子代所能接触到的就业机会与最终获得的职业地位。然而，这种影响并非线性或单一的，它受到时代变迁、制度安排(如户籍)、技术革新等多重因素的调节与塑造。该部分旨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围绕父辈资本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核心机制、调节因素以及现有研究的争议与不足展开论述，以期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清晰的脉络与参考，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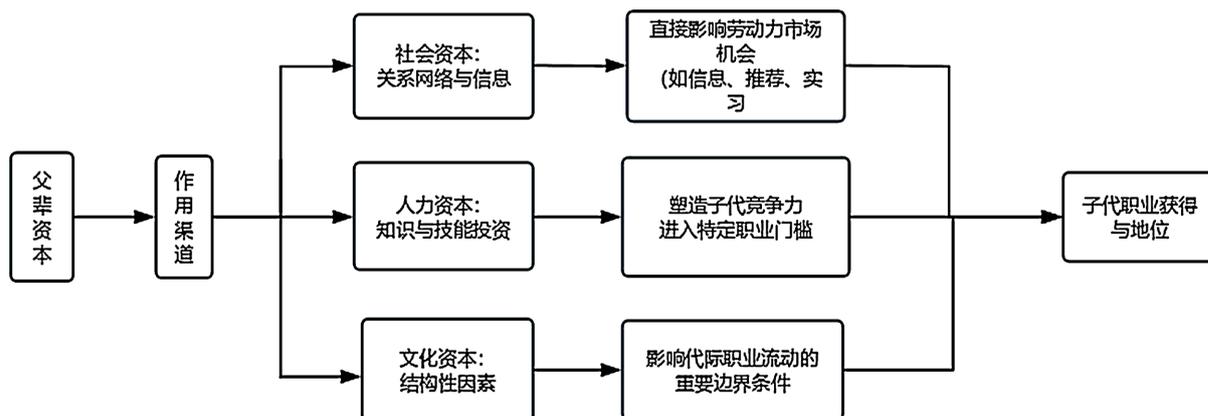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role of parental capital in the career acquisition of offspring

图1. 父辈资本作用于子代职业获得

2.1.1. 父辈社会资本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

父辈资本对子代职业流动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一种综合性的“先赋性”优势或劣势的传递。多项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证实[1]，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预测子代职业成就的关键变量。这种传递并非简单的职业“世袭”，而是一个通过资源、信息、价值观等多重渠道实现的复杂过程[2]。具体而言，父辈较高的职业地位往往意味着更丰厚的经济资源、更优质的社会网络以及更高的教育期望，这些因素共同为子代营造了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环境。相反，父辈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其子代在职业起点上则可能面临资源匮乏与机会受限的双重困境。研究表明，这种基于父辈地位的代际影响在不同出生队列

中持续存在，尽管其作用强度与模式可能随着社会变迁而有所变化。对于不同年代的出生组，父辈因素显示出的解释力有显著差别，但教育等因素的中介作用日益凸显。只有把父辈资本放在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社会历史框架中去看，才能真正理解它的结构性力量及其机制的时代特征。

在父辈资本的构成中，社会资本，即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被认为是促成职业地位代际传递最为直接的机制之一。父辈通过其职业与社会活动所积累的人脉关系，能够为子代提供关键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实习机会乃至直接的就业岗位推荐，从而显著降低子代求职过程中的搜寻成本与不确定性[3]。这种“关系”的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的劳动力市场中尤为突出，它使得拥有优势社会资本的子代能够更快、更精准地匹配到优质的职业机会。研究指出，父辈的社会资本不仅直接影响子代初职的获得，还可能对其整个职业生涯的晋升轨迹产生长远影响。然而，社会资本的效用并非均质的，它受到子代自身条件与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例如，对于农村户籍或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子代而言，其父辈的社会网络可能局限于本地或低端劳动力市场，难以提供跨越阶层边界的有效助力，这反而可能强化了职业地位的代际固化。因此，社会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阶层跃升的“助推器”，也可能成为阶层壁垒的“黏合剂”，其最终效应取决于资本的质量、子代的转化能力以及外部机会结构的开放性。

2.1.2. 父辈人力资本对子代职业地位的影响

除了直接的社会关系运作，父辈资本还通过塑造子代的人力资本，即知识、技能与健康，来间接地影响其职业流动。其中，教育是最为核心的中介通道[4]，父辈的职业地位、经济实力与文化素养深刻影响着子代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的多寡与质量。优势家庭能够投资于更优质的早期教育、课外辅导乃至海外留学，从而帮助子代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最终获得更高含金量的学历文凭。而学历作为劳动力市场中最主要的信号筛选机制，直接决定了求职者进入的职业门槛与起薪水平。研究普遍证实，教育机会与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关键因素。父辈通过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确保子代获得优质教育，进而帮助其获得高阶职业地位，是代际优势传递的一条经典路径。然而，教育的回报率同样并非一成不变。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学历的普遍升值可能导致“学历通货膨胀”，使得家庭背景一般的子代即便付出巨大努力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竞争优势也可能被稀释。此时，父辈资本可能转而通过影响子代就读院校的声望、专业选择的热门程度以及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质量等更为精细的渠道，来维系其代际影响力[5]。这表明，父辈资本通过教育中介影响职业流动的机制正变得日益复杂和隐蔽。

2.1.3. 结构性因素对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

城乡二元分割与户籍制度，构成了父辈资本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重要边界条件，甚至可能重塑其作用方向[6]。大量研究揭示了城乡之间在代际职业流动模式上存在的显著差异。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父辈资本的存量往往相对有限，其子代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长期以来依赖于通过教育实现“跃农门”。然而，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弱等结构性障碍，使得这条路径充满挑战。即便农村子代成功通过高考进入城市，他们在就业时仍可能面临因户籍身份带来的隐性歧视或社会保障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人力资本投资的应得回报。相比之下，城市家庭，尤其是拥有本地户籍的家庭，其父辈资本能够更顺畅地转化为子代的职业优势[7]。这种城乡差异不仅是经济资源多寡的问题，更是制度性壁垒所导致的机遇不平等。它使得同样水平的父辈资本，因附着于不同的户籍身份之上，而产生迥异的代际传递效能。因此，脱离城乡分割的宏观结构来谈论父辈资本的影响，将难以把握中国代际流动问题的全貌与深层矛盾。

2.2. 代际职业流动中数字技术的影响

数字技术主要通过以下相互关联的机制促进代际职业流动：

2.2.1. 信息获取与机会扩展机制

数字技术通过互联网平台显著降低信息不对称,扩展了个体的职业选择空间。它使劳动者(尤其是农村与偏远地区居民)能够便捷获取招聘信息与市场动态,减少对本地封闭社会网络的依赖[8]。针对农村居民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帮助他们跨越地理与信息鸿沟,接触非农就业与新业态机会,从而削弱父辈职业对子代的约束[9]。同时,数字经济催生了外卖、直播、网约车等大量低门槛新职业,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了替代性的向上流动路径[10]。

2.2.2. 人力资本重塑与技能适配机制

数字经济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结构,进而影响了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与积累方式。一方面,其催生的新就业形态对传统学历要求较低,却对数字素养等新技能提出要求,这减弱了父代专业知识对子代职业的直接影响[10]。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家庭收入,缓解了低收入家庭对于代教育投资的预算约束[11],同时激励个体通过在线学习自主提升技能,形成“技能提升-职业流动”的良性循环。

2.2.3. 家庭资本作用的重构机制

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家庭资本在代际传递中的角色。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虽然可能促进家庭经济与文化资本增长,但其对社会资本的作用呈现分化:对于高社会资本家庭,子代若过度依赖家庭资源,反而可能抑制其主动寻求数字机遇的能动性;对于低社会资本家庭,数字技术则提供了在线社群、职业平台等替代性社会网络,帮助子代突破家庭资源局限[12]。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资本对职业获得的绝对决定性,增强了个人能力与努力的可见性。

上述机制共同作用如图2,推动社会整体机会结构趋于公平。数字平台推动就业信息透明化与流程标准化,有助于减少“人情就业”与歧视[8]。数字环境也有助于积累基于兴趣和能力的“新型社会资本”。最终,数字技术通过扩展信息、重塑技能、重构家庭资本等多重路径,显著促进了代际职业与收入流动,其影响尤其惠及农村地区、低人力资本与弱势家庭子代,呈现出普惠性与包容性特征,为社会流动注入了新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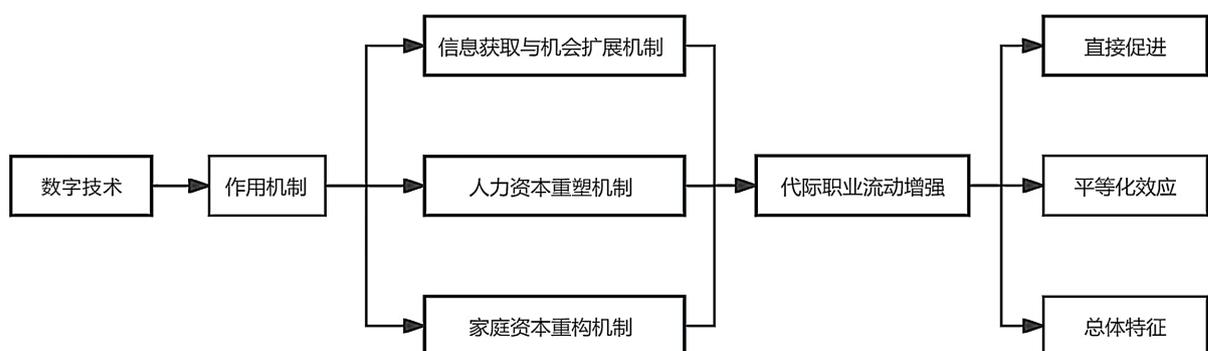


Figure 2. Pathway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mpacting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图2. 数字技术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路径

2.3. 矛盾与不足

现有研究揭示了代际流动中父辈资本的结构性延续与数字技术赋能的革命性潜力之间存在核心张力:前者通过社会网络、教育传递与制度壁垒(如户籍)构筑了相对封闭的再生产体系;后者则借助信息平权、技能重塑与新职业创造,为弱势阶层子代开辟了看似开放的流动路径。然而,二者并非简单替代,数字技术可能正在催化一种更为隐蔽的“数字代际转移”——优势家庭通过早期数字素养投资、优质线上资

源获取等方式, 将其传统资本转化为子代在新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同时, 数字红利并未均质分布, 它可能催生了“表层流动”与“实质固化”并存的新困境: 弱势群体虽获得零工经济等就业机会, 却往往陷入职业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的发展陷阱, 而算法管理、数据壁垒等新型门槛, 可能正与传统的城乡、户籍壁垒交织, 重塑着不平等的形态。因此, 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超越“技术决定论”或“结构决定论”的单一叙事, 构建一个动态的“技术-结构-制度”互动框架, 深入剖析传统资本与数字赋能如何相互渗透、转化, 并通过对新业态中长期职业轨迹与福利后果的追踪, 揭示数字时代社会流动的真实图景与深层机制。

3. 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分析

代际收入流动是衡量社会机会公平的核心标尺。在我国全面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 深入探讨代际收入流动对子代教育机会与质量的影响机制, 可为研究基础教育数字化对代际流动的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参考。

在理论上, 代际收入流动衡量的是父代与子代经济地位之间的关联强度, 其本质关注的是机会平等而非结果均等。贾可卿(2022)对约翰·罗默正义理论的阐释中强调, 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机会平等, 即努力消除家庭出身等个人不可控因素对人生前景的决定性影响[13]。Mitnik(2025)的研究进一步表明, 代际流动性的测度指标与“机会不平等”的量化之间存在内在的理论联系[14]。上述“机会平等”的理论表明, 较高的代际流动性通常被阐释为社会结构开放、个人努力回报率高的标志, 说明社会为不同出身的人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则被视为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增加的一种表征。

在测量方法上, 学术界逐步发展并确立了以“代际收入弹性”为核心的分析框架。Becker 和 Tomes (1979)为理解代际传递强度提供了基础理论[15]。基于此, 大量研究对中国社会的流动性进行了精确测度与趋势分析。陈琳(2016)研究发现, 我国城镇代际收入弹性在 1990~1995 年和 1998~2002 年两个时期分别约为 0.8 和 0.4, 提示了流动性增强的趋势[16]。杨沫和王岩(2020)则发现, 代际收入流动性在 2004 年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17]。同时, 阳义南和连玉君(2015)的研究发现, 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影响在 2006 年至 2010 年间显著下降, 表明我国社会代际流动性呈现积极改善趋势[18]。这些研究表明, 代际流动性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会随着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变迁与公共政策干预而发生深刻变化。近年来,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审视代际收入流动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魏下海和李胡建(2024)与方福前等人(2023)的研究分别证实, 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11][19]。这提示, 基础教育数字化很可能通过干预人力资本形成、信息获取等传统传递渠道, 对代际流动产生深远影响。因此, 探究基础教育数字化的具体作用机制仍是重要研究方向。

3.1. 父代资本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机制

父代的收入优势可以转化为子代在教育竞争中的先发优势, 并影响其最终社会经济地位。这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与文化资本传递两条路径的复杂机制形成, 如图 3。

人力资本理论表明, 家庭被视为对子代未来进行理性投资的核心决策单元, 其教育投资规模与方式深受家庭资源约束与预期回报的影响[15], 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中国家庭的教育支出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撑。

3.1.1. 人力资本投资领域

付费性课外补习是家庭经济资本转化为子代学业优势的核心机制, 被称为“影子教育”。研究表明,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教育投资的强度与形式。高 SES 家庭更倾向于采用课外辅导班与家长辅导双重叠加的投资组合模式[20], 而低 SES 家庭则可能面临预算约束, 无力承担额外补习费用[20][21]。这种因收入分异导致的投资差异, 直接传导至教育结果的不平等。薛海平(2018)的研究进一

步揭示,影子教育在家庭资本与子女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22]。方超与黄斌(20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校外支出对认知能力的影响表现为“强者愈强”,即额外投资对原本处于成绩分布高端的学生提升作用更大,从而加剧了教育结果的“马太效应”[23]。此外,经济优势不仅意味着支付能力,更意味着抗风险能力和长远规划空间。李广平等(2023)的研究指出,高SES家庭子女在面临关键教育分流时,不仅能够获得更优质的学校资源,其家庭也更有能力支持其选择回报周期更长、不确定性更高的教育路径[24]。吴愈晓(2020)从宏观视角说明,在教育回报率上升的社会背景下,各阶层对教育竞争的投入加剧,而优势阶层凭借其丰厚的经济资本,在争夺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教育获得的阶层差距持续存在甚至扩大[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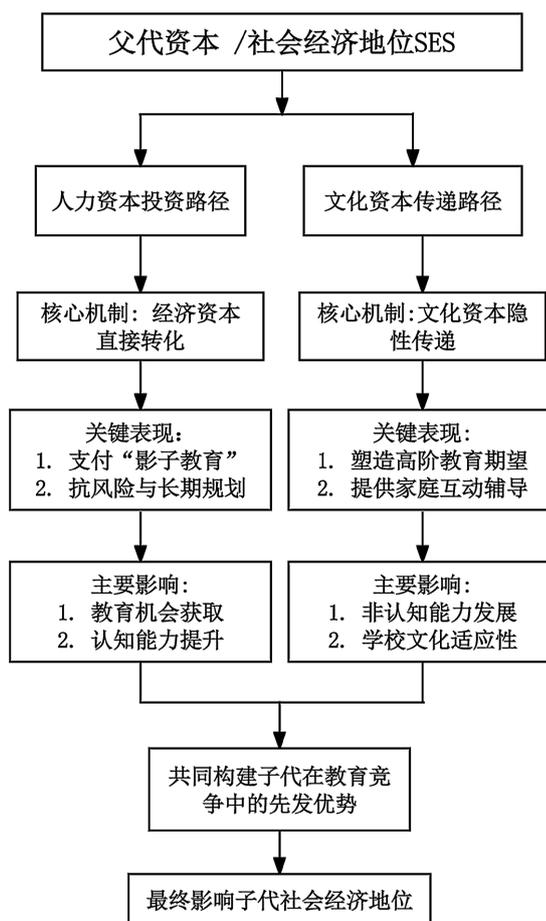


Figure 3. Path of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fluenced by parental income
图 3. 父代收入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路径

3.1.2. 文化资本领域

主要通过塑造教育期望与提供“隐性辅导”,直接影响子代学业表现。文化资本丰厚的家庭,其家长往往具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和更科学的参与能力。这种高期望与“家庭交流”、“家庭互动”相结合,构成了强有力的教育支持[26] [27]。朱晓文等(2019)的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投入是青少年教育期望形成分层的重要中介机制,精英阶层子女从文化资本投入中获益更多[28]。这种由文化资本支撑的高期望与高参与,使优势阶层子女在学校场域中感到更加自如与适应[29] [30]。同时,非认知能力是文化资本产生回报的关键中介变量。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能显著促进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发展[31]。而这些非认知能力,

如毅力、社交能力和情绪稳定性，在教育引致的社会地位获得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32]。此外，文化资本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存在“阶层再生产”特性，即高阶层的回报率更高[31]。

3.2. 数字经济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数字金融、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普及，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已成为一个兼具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学术命题。现有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在总体上对提升代际收入流动性具有促进效应，且其作用是通过创造新型机会和缓解传统代际传递的关键约束等宏观与微观的机制实现的，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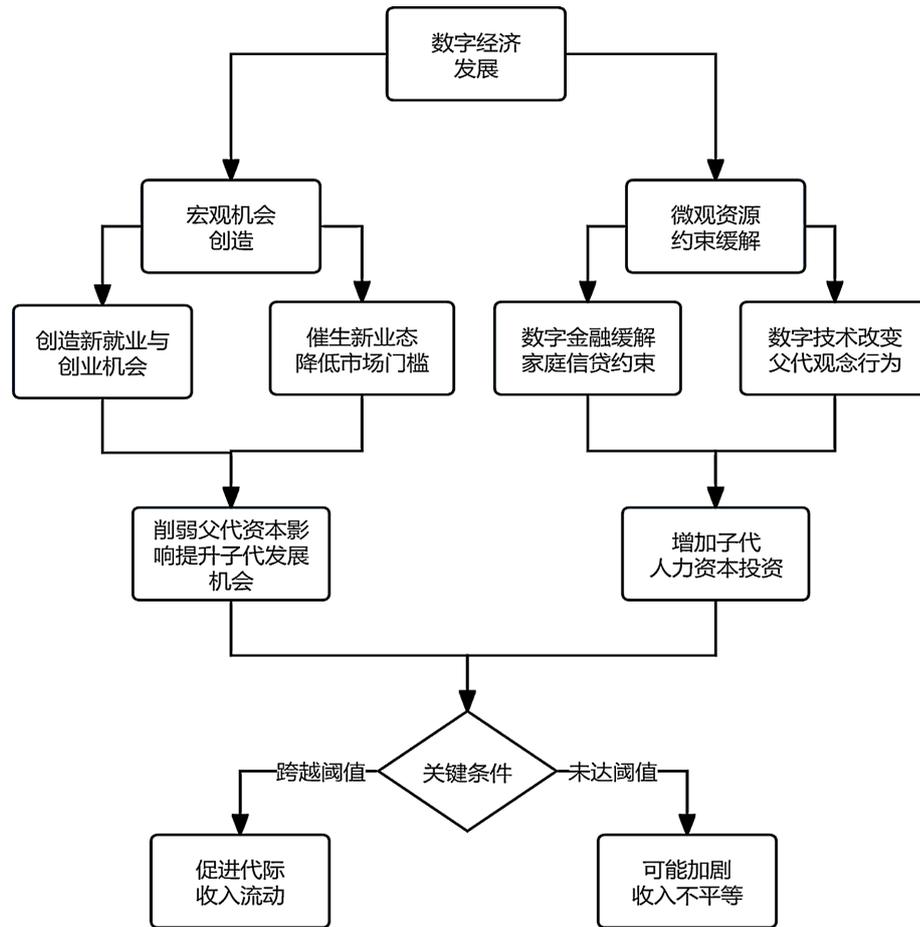


Figure 4. Pathways of digital economy impactin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图4. 数字经济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路径

3.2.1. 宏观层面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创造新型就业创业机会和优化经济结构[33][34]，为代际流动创造有利环境。一方面，数字经济具有高渗透性和便捷性，带来了高质量就业岗位增加，中高技能劳动力收入提高等诸多机遇[35]，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魏下海和李胡建(2024)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自相关性[11]。且其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能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而活跃的创业环境能为年轻子代群体提供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拓展其社会资本，从而有助于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代际流动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新兴消费需求还有助于突破传统行业的固有模式，催生出新产业、

新业态，如平台经济、电子商务等，从而降低创业门槛和市场信息壁垒[36]。刘翠花等(2025)基于“淘宝村”的实证证据进一步揭示，农村电商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其核心作用在于减弱了父代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代职业与收入获得的决定性影响[37]。

3.2.2. 微观层面

学者多聚焦于数字金融的关键作用。其核心逻辑是，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低收入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改善其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从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周广肃和丁相元(2023)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其关键中介路径正是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代际教育流动[38]。传统金融体系下，低收入家庭因缺乏抵押品和信用记录而难以获得教育信贷。数字金融借助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降低了服务门槛与信息不对称，使得弱势家庭能够更便捷地获取教育信贷、平滑消费与投资[39][40]。戚聿东等(2025)的研究也证实，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家庭信贷约束，显著促进了教育代际流动，并称之为“机会增益效应”与“机会共享效应”[41]。数字经济的影响不仅通过金融工具，还通过改变父代的观念与行为来实现。王月等(2023)的研究发现，父代使用数字技术能够改善其对社会“机会不平等”的感知，从而激励其增加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9]。然而，这一促进效应并非线性或无条件成立。赵立业和吴卫星(2023)的研究揭示了重要的“门槛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未达到一定阈值前，其发展可能因“数字鸿沟”的存在而增大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流动，只有当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后，其促进流动的积极效应才会充分显现[42]。

3.3. 矛盾及不足

现有研究在父代收入与数字经济两条线索的交汇点上暴露出新的张力与盲区。一方面，父代资本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文化资本传递的双轨机制，将经济剩余转化为子代教育竞争中的结构性领先。其中，高支付能力家庭通过课外补习、优质学区、风险耐受型教育等路径，把收入梯度固化为学业梯度，再固化为未来收入梯度；而低支付能力家庭则因预算约束与信息缺口，被迫退出高回报赛道。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被寄予机会平等的厚望。数字金融纾解信贷约束、电商降低创业门槛、平台经济打破地域隔离，看似为弱势子代提供了跳脱父辈收入框架的平行通道。然而，在发展水平未跨越临界值之前，优势家庭仍可凭借早期设备占有能力，率先把传统资本兑换为数字资本；弱势家庭则多在平台经济下游从事弹性零工，收入波动大、社会保障低。更严重的是，现有研究普遍采用“当期收入弹性”或“短期创业概率”作为流动性的代理变量，忽视了全链条追踪，导致“数字红利”可能被高估，“数字风险”则被系统性低估。未来亟需构建长周期面板，通过准实验设计识别数字基础设施跃迁等政策冲击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异质性处理效应，才能厘清数字技术究竟在何种条件下真正削弱父代资本，又在何种门槛下反而催生新的“数字代际转移”，从而为精准干预、制度创新与公共政策提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证据基石。

4. 结论与建议

4.1. 理论结论

4.1.1. 代际职业流动

职业路径仍是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但其边际效力呈现明显的阶段分化。数字技术通过信息平权、技能重塑与新职业创造，显著提升了职业流动性，尤其对农村、低社会资本家庭子代的向上流动具有普惠效应，互联网使用帮助农村家庭子代跨越地理与信息鸿沟，接触非农就业与新业态机会，平台经济为零工劳动者提供了绕开传统壁垒的替代性路径。然而，这种“活跃”具有表层性：优势家庭通过早期数字素养投资、优质线上资源获取，将传统资本转化为数字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弱势家庭虽获得零工就业

机会，却多陷入职业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的发展陷阱，形成“岗位流动频繁、阶层位置固化”的新困境。更关键的是，职业晋升对收入溢价的兑现能力持续弱化，高校扩招后“学历通胀”与“专业错配”使职业等级提升的收入回报率下降，“岗升薪滞”现象在体制分割行业与户籍歧视地区尤为突出。

4.1.2. 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路径的独立权重显著上升。父代资本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课外补习、优质学区)与文化资本传递(教育期望、家庭互动、非认知能力培养)的双轨机制，将经济剩余转化为子代教育竞争中的结构性领先，进而固化为未来收入梯度，高 SES 家庭子女的认知能力回报率显著高于低 SES 家庭，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数字经济的介入并未简单消解这一逻辑：数字金融虽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改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对代际收入弹性产生负向影响，但其促进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临界值前，优势家庭凭借设备占有能力、信息处理能力，率先将传统资本兑换为数字资本，反而可能扩大代际收入关联性。

4.2. 政策建议

4.2.1. 教育政策

由人社、教育、统计部门及行业协会联合建立与行业薪酬指数动态挂钩的“技能紧缺职业准入清单”，并将其与院校专业设置、财政补贴及企业信贷政策联动，引导资源配置；在重点行业全面推行以“能级工资”为核心的技能人才薪酬集体协商，将技能等级、实际贡献作为薪酬决定性因素，并通过制度设计贯通“技能-技术-管理”职业发展立交桥，切实恢复职业晋升的收入溢价信号。

4.2.2. 数字政策

在县域层面，可构建“政府主导-平台协同-社区落地”的三方联动机制，设立“数字融合服务中心”，将数字素养普及(如社区数字辅导员制度)、模块化职业技能培训(对接本地产业需求)与普惠金融产品(如小额数字信用贷)进行“一窗式”捆绑供给，并通过积分激励与效果追踪确保弱势家庭的持续参与和实际转化；针对平台从业者，强制平台按单量比例计提“职业保障基金”，用于职业伤害险的保费支付及个人技能账户充值，账户资金专用于经认证的再培训课程，同时将培训成果与平台派单优先级、社保补贴挂钩，形成“保障-提升-发展”的闭环，使零工就业在制度护航下转化为可持续的生计转型路径。

4.2.3. 财税与产权政策

在县域设立“职业关联财富评估中心”，依托税务与社保数据建立“职业-财富”联动档案，对主要财富来源于非职业性渠道(如继承、投机)的资产在房地产税与遗产税中适用阶梯式附加税率，所征税款定向注入县域“技能振兴基金”。同步，由该基金担保并运营“产权-技能”转换平台：经合规评估后，低收入家庭可将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资产股权在该平台托管并生成“技能信用证”，凭此证全额抵扣在县职教中心的指定技能培训费用；完成培训并稳定就业后，其托管产权可通过平台优先流转，或选择按“本金+增值收益”赎回，形成“以税促衡、以产育能、以能固产”的闭环调节机制。

4.2.4. 治理机制

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枢纽，整合教育部门的学历与培训数据、税务部门的收入数据、医保社保部门的参保数据，构建个人匿名化的“能力-就业-收入”全周期追踪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设计双层级评估与反馈机制：第一，对政府购买的职业培训项目，将其财政补贴额度与参训者结业后1~3年的“收入跃升率”(与地区同业平均收入对比)动态挂钩；第二，对吸纳就业的企业，将其享受的税收减免、社保优惠等再分配政策力度，与其内部“岗位升级率”(中高技能岗位占比年度变化)及员工收入增长幅度

关联。最终，通过动态可视化的“岗位-报酬”政策仪表盘，实时呈现不同行业、区域、人群的政策效果，为精准调整培训方向、优化财税激励提供数据驱动的决策依据。

4.3. 研究不足

本文仅聚焦代际职业与代际收入两条主路径，尚未覆盖健康、婚姻、社会资本及数字资本等潜在机制；同时，目前尚未针对两条路径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展开系统性、深入性的探究，未能充分揭示二者在逻辑架构、作用机理以及相互影响等方面的复杂关系。未来研究可引入多维度流动指标，并借助行政大数据延长观测窗口，以构建更完备的代际流动解释框架。

参考文献

- [1] 王月, 屈小博, 霍学喜. 父辈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的影响及其变迁趋势[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4): 150-160.
- [2] 刘新宇. 父代职业地位对子代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5.
- [3] 梁霄羽. 社会资本与代际职业流动的实证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大学, 2018.
- [4] 卢盛峰, 陈思霞, 张东杰. 教育机会、人力资本积累与代际职业流动——基于岳父母/女婿配对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动态, 2015(2): 19-32.
- [5] 邵宜航, 张朝阳. 关系社会资本与代际职业流动[J]. 经济学动态, 2016(6): 37-49.
- [6] 王春光. 中国职业流动中的社会不平等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2): 31-40.
- [7] 高伊宁. 中国城乡居民职业代际流动差异及其变化趋势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16.
- [8] 周利, 尤济红, 冯大威. 数字经济发展、机会不平等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职业流动的视角[J]. 南开经济研究, 2024(9): 111-129.
- [9] 王月, 张强强, 霍学喜. 平等抑或固化——数字技术能否促进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5(7): 16-29.
- [10] 杨芸. 数字经济发展与代际职业流动——基于人力资本异质性视角[J]. 管理现代化, 2024, 44(5): 101-112.
- [11] 魏下海, 李胡建. 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促进社会代际流动? [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4, 44(1): 85-101.
- [12] 郑小碧, 丁伊宁. 数字经济、家庭资本与代际职业流动[J]. 中国人事科学, 2025, (11): 36-52.
- [13] 贾可卿. 社会主义与机会平等——约翰·罗默的正义理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2(2): 5-13.
- [14] Mitnik, A.P. (2025)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come Mobilit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ies, Correlations, and Rank-Rank Slope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54, 1289-1338. <https://doi.org/10.1177/00491241251352102>
- [15] Becker, G.S. and Tomes, N. (1979)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 1153-1189. <https://doi.org/10.1086/260831>
- [16] 陈琳. 中国城镇代际收入弹性研究: 测量误差的纠正和收入影响的识别[J]. 经济学(季刊), 2016, 15(1): 33-52.
- [17] 杨沫, 王岩.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J]. 管理世界, 2020, 36(3): 60-76.
- [18] 阳义南, 连玉君. 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CGSS 与 CLDS 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5(4): 79-91.
- [19] 方福前, 田鸽, 张勋. 数字基础设施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研究, 2023, 58(5): 79-97.
- [20] 张美丽, 吴瑞君. 我国初中生课外补习的方式及其影响因素[J]. 教育学术月刊, 2021(1): 42-49.
- [21] 宋海生, 薛海平. 初中生课外补习支出: 现状、影响因素及政策启示[J]. 当代教育论坛, 2018(4): 83-92.
- [22] 薛海平. 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 基于影子教育中介效应分析[J]. 教育与经济, 2018(4): 69-78.
- [23] 方超, 黄斌. 马太效应还是公平效应: 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结果不平等的异质性检验[J]. 教育与经济, 2020, 36(4): 58-67.
- [24] 李广平, 陈武元, 吴尧. 先赋背景、重点学校和个人期望孰轻孰重——兼论三种因素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现实机制[J]. 教育发展研究, 2023, 43(17): 64-75.

- [25] 吴愈晓. 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公平: 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4): 18-35.
- [26] 安桂清, 杨洋.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家长参与对子女学业成就影响的差异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38(20): 17-24.
- [27] 于冰洁, 余锦汉. 家庭文化资本、家长参与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20(1): 18-24, 30.
- [28] 朱晓文, 韩红, 成显萱. 青少年教育期望的阶层差异——基于家庭资本投入的微观机制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9(4): 102-113.
- [29] 谢爱磊, 洪岩璧, 匡欢, 等. “寒门贵子”: 文化资本匮乏与精英场域适应——基于“985”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的追踪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8, 16(4): 45-64, 185.
- [30] 文军, 李珊珊. 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阶层差异及其影响——基于上海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比较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0(4): 101-113, 175.
- [31] 张学敏, 赵国栋. 子女非认知能力发展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家庭资本投入的微观考察[J]. 教育与经济, 2022, 38(4): 40-47, 59.
- [32] 黄艳敏, 申家丽. 教育如何改变命运? 新人力资本视角下教育决定社会地位获得机制探索[J]. 教育与经济, 2022, 38(6): 24-34.
- [33] 赵涛, 张智, 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0, 36(10): 65-76.
- [34] 纪园园, 朱平芳.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 需求牵引和供给优化[J]. 学术月刊, 2022, 54(4): 63-77.
- [35] 谢绚丽, 沈艳, 张皓星, 等. 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8, 17(4): 1557-1580.
- [36] 丛屹, 俞伯阳. 数字经济对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0, 41(2): 108-114.
- [37] 刘翠花, 戚聿东, 丁述磊. 数字乡村与代际收入流动性: 基于淘宝村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25, 48(2): 230-256.
- [38] 周广肃, 丁相元.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40(4): 160-179.
- [39] 贺娅萍, 徐康宁. 互联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中国事实的检验[J]. 经济经纬, 2019, 36(2): 25-32.
- [40]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等.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 经济研究, 2019, 54(8): 71-86.
- [41] 戚聿东, 莫建霖, 李三希. 数字金融与教育代际流动: 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5(5): 117-139.
- [42] 赵立业, 吴卫星.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5): 64-75.